

# 复归·创变·融汇

## ——现代性危机下托马斯·曼创作中的歌德元素<sup>①</sup>

洪雨涛 莫光华



**【摘要】** 面对 20 世纪上半叶发展到极致的西方理性,以及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托马斯·曼试图开辟一条弥合二元对立、重塑完善人格的精神救赎之路。通过接受并发展歌德关于“亲和力”“市民修养”“世界文学”的思想,托马斯·曼在其作品中复归古典、创变传统、融汇东西,试图借此疗愈欧洲社会的现代性病症。其此番创作中的跨时空呼应充分体现托托马斯·曼与歌德在美学理念上的高度契合,以及浸润其中的德意志文化底色。

**【关键词】** 托马斯·曼;歌德;现代性;亲和力;修养;世界文学

### 1. 引言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上叶,欧洲社会处于思想交锋与末世情绪弥漫的转型期,“现代性”也深陷危机,此状态“意味着严重的不正常,甚至不正常到要威胁事物本身的存在”(张汝伦,2018)。通常认为,这一危机源于“现代性”三大核心要素的内在缺陷:理性主义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因其排斥非理性和过度工具化而导致思维僵化;主体原则强调主客二分,使人与世界的和谐关系被割裂;线性发展观的乐观进步主义则助长了单一化和同质化倾向。(王金宝,1999)工业化、科技扩张的负面效应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更加剧了“现代性”的瓦解,带来了理性主义、主体原则和线性发展观的全面衰退。可以说,当托马斯·曼(Thomas Mann)在德国乃至欧洲文坛崭露头角时,欧洲资产阶级正深陷严峻的存在困境和文化危机之中。(Dierks,2001)

面对“现代性”带来的二元对立与个体分裂,有学者呼吁通过艺术整合精神、捍

<sup>①</sup> 本文为纪念托马斯·曼诞辰 150 周年、逝世 70 周年而作。

卫个体,以回应现代社会的困境。(Lefebvre, 2003)因此,早在 19 世纪末,欧洲思想家便开始尝试纠正“现代性”弊端,这也致使虚无主义、审美主义等思潮大行其道。然而,由于受限于“现代性”的思维惯性,他们的反思和批判并不彻底,或者说否定有余而创变不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在此意义上,托马斯·曼的文学创作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他通过揭示现代人在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心灵困局,试图以文学调和个体内在的二元对立,重建完整人格与精神家园。在这一过程中,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作为魏玛古典文学的代表人物,提供了关键的思想资源。歌德提倡理性与感性的平衡、多元文化的融合,以个体的完善推动整体进步。这成为托马斯·曼汲取灵感的重要源泉,他一再回溯歌德思想,借此探索一条克服“现代性”危机的文学之路。

## 2. 追求“亲和力”:对和谐统一理念的复归

歌德的小说《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 1809)描绘了一场因婚恋伦理观差异而引发的爱情悲剧,作者试图借用化学现象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关系。“亲和力”指元素之间相互吸引与联合的天然属性,能引起旧化合物的分解和重组,进而形成新的化合物。也就是说,促成爱情的“亲和力”是自然的,或曰生物性的,而婚姻制度却是不自然的,往往是受经济甚或政治利益驱动和制约的理性产物;就此而言,爱情与婚姻二者之间的张力与较量最终造成了小说中两对恋人的悲剧。欲念与道德的这种不可调和性,在二元论思维占主导地位的 19 世纪欧洲并不鲜见。但若从诗学上审视《亲和力》就会发现,这部小说堪称“形式与思想之统一”(Einheit von Gestalt und Gedanke)<sup>①</sup>的典范(Mann, 1960: 186),因为歌德凭借温和克制的语言和包孕哲思的诸般理念,让伦理的矛盾与放纵的激情得以共存。这种理性与感性于动态平衡中和谐共生的“亲和关系”给托马斯·曼以启发,去思索对立要素间是否真必须非此即彼。

托马斯·曼心目中的歌德形象与其对“精神—生活”的二分法认知联系紧密。青年时代的他在小说《艰难的时刻》(*Schwere Stunden*, 1905)中借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之口让歌德走上神坛,可这种神化背后却是一种带有“思慕般敌意的爱”(Mann, 1960: 372)。此时,曼氏俨然将自己与席勒划为外在于自然且含辛茹苦追求坚强意志的感伤诗人,故而对保持主客一致、属于自然写实派的歌德敬而远之。这种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在其《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 1901)、《特里斯坦》(*Tristan*, 1903)、《托尼奥·克勒格尔》(*Tonio Kröger*, 1903)等早期作品中均有体现:颇具才华的主人公背负着社会局外人和艺术殉道者的沉重枷锁,当爱

<sup>①</sup> 本文所引德语文献的中文,如无特别说明,均为笔者自译。

欲和激情引起痛苦乃至吞噬生命时,方才展露出宏大的魅力。

直到写作中篇小说《死于威尼斯》(*Der Tod in Venedig*, 1912)时,托马斯·曼对歌德的刻板印象才出现松动——有必要指出,正是诗人晚年在玛丽恩巴德(Marienbad)那段不幸的黄昏恋经历给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感。(Mann, 1983: 37)具有作者自画像特质的小说主人公阿申巴赫受限于公式化的文学形式,奉行苦行僧式的作家生活,深陷灵感枯竭的创作危机,最后彻底沉溺于感官欲望而走向死亡。作为曼氏早期“艺术家小说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死于威尼斯》既是其美学理念的阶段性汇总,也是其未来写作主题的预演。阿申巴赫的悲剧命运映射出作者对二元关系的思索:既然倚靠任何一方都不免失败,那是否存在综合矛盾两极的可能性与拓展空间?该问题的形成与解答或许源于《亲和力》——托马斯·曼在1920年7月4日致卡尔·玛利亚·韦伯(Carl Maria Weber)的信中表示,他在写作《死于威尼斯》期间,把歌德的《亲和力》读了足足5遍,书中悄然凸显的“感性与道德的平衡”(Gleichgewicht von Sinnlichkeit und Sittlichkeit)正是其创作追求的目标。(Mann, 1962: 176)也就是说,他震惊于歌德在仁爱与严苛、清楚与神秘、理智与冲动、形式与感受间取得的高度均衡,同时也看到了一种“圆满”(Vollendung)的希望。(Mann, 1960: 175)值得玩味的是,歌德此时却被托马斯·曼褫夺神性,跌入尘世:在1913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以近乎嘲弄的口吻描绘了歌德晚年爱情失意的窘态:德隆望尊的老诗人在爱欲冲动下尊严尽失——被绊倒后无法独立站起,狼狈不堪,面对倾心的少女羞愧得双眼噙泪。(Mann, 1983: 38)这意味着,歌德不再是圣坛上受托马斯·曼仰望的神,而是一个也会因爱而不得遭受失望和痛苦的凡人。可以说,托马斯·曼正在摈弃席勒的唯心式“理性—感性”分裂观,因为哪怕代表自然的歌德也并非时刻理智清醒,他面临的精神困境恰恰证明其“天性中包含着各种对立”(Mann, 1960: 301)。同时,身为同性恋者的托马斯·曼无比恐惧因其性向暴露而遭受奚落。从心理学上讲,他对歌德这段忘年恋添油加醋的刻画,意在为后者的形象增添荒诞性,进而以此拉近自身与这位伟人的距离。至此,两人间的认知隔阂终于消散,双方关系有了根本性进展,托马斯·曼开始逐步迈向歌德“万汇本一如,彼此相连带”(Goethe, 1978)的整体观。

此后,托马斯·曼采取了一种冷眼静观的“零度写作”(Barthes, 2008)姿态,即既不做取舍也不抱立场,只以作品或主人公为角斗场,让针锋相对的思潮在其中碰撞交融,引领读者直面多样的现实与复杂的人性。其政论散文《一个不问政治者的思考》(*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 1918,以下简称《思考》)和长篇小说《魔山》(*Der Zauberberg*, 1924)便是一对例证。《思考》广泛引用了德国乃至西方文化、政治名人的言论,让庞杂的思维碎片在交锋中共存,由此反思德意志文化与现代政治文明不可兼容之极端论调。而在《魔山》中,各种观念披上角色的外衣,譬如代表人文启蒙思想的赛特布里尼、崇尚宗教的保守主义者纳夫塔、东方原则的化身

肖夏夫人等,仿佛汇聚于坩埚里的诸多实验元素,它们自由挥发、相互冲击,于是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的思想发生了剧变,就像经历了“炼金术”(Mann,1983:612)的改造。他也终于在梦中见到了完善之人:“作为他们人格基础的精神和感官,我想讲,在他们身上是紧密联系、和谐一致的!”(Mann,2010:349)上述中立态度在曼氏后期作品《绿蒂在魏玛》(*Lotte in Weimar*,1939)中得到进一步体现。借助秘书里默尔和绿蒂的对谈,托马斯·曼将这种态度比作由一只天堂眼和一只地狱眼汇聚而成的目光,是凝练仁爱与冷漠,跨越善恶鸿沟,从而联结自然和精神的“绝对艺术”,在此境界中,“最伟大的天赋和最惊异的稚气统一在一个人身上”(Mann,2008:66)。回过头看,曼氏笔下的歌德,经历了由“神”到顾此失彼的“凡人”再到和谐完美的“伟人”的嬗变,与之对应的正是作家本人克服二元对立、走向统一的过程。平等呈现不同观点,不设绝对价值取向,秉持批判的眼光考察各对立范畴的生发状态,这无疑是托马斯·曼对歌德“本性中深刻的亲和力”(Blume,1949)的一次实践与延展。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托马斯·曼笔下“亲和关系”的成型离不开“理想人格”的参与。同时,如何由特殊到一般,让成熟和谐的人性通过后天培养实现,而非取决于先天禀赋,成为他亟待解决的又一难题。

### 3. 颠覆《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对传统修养范式的创变

谈到人格养成,便不得不提歌德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1795/1796)。它以个体发展为蓝本,在展现时代全貌的同时,讲述了主人公迈斯特从戏剧使命出发,由艺术家进化为时代新人的故事,被誉为“修养小说(Bildungsroman)的榜样”(Morgenstern,1949)。托马斯·曼将其中通过修养而不断臻于至善的人性视为艺术作品的最高准则,可在相关创作中却又有有意偏离典范般的“迈斯特式”个人成长要素。他这般跟歌德“唱反调”,意欲何为?要理解这一点,首先不容忽视的,应该是古典修养精神在后歌德时代的命运。

众所周知,19世纪是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形成的关键时期。在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入侵以及普鲁士王朝战争的背景下,修养被迫背负起提振人民精神凝聚力的政治使命,即利用自带的“公共性”(谷裕,2023)为集体意志提供法理依据。不仅如此,技术革命带来的职业分工精细化和工具理性价值观则在不断蛀蚀修养的基础——全面的人文教育,使之异化为面向工农大众的技能培训(Ausbildung),沦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批判的那种泛滥、肤浅的“伪修养”(Pseudo-Bildung)(Nietzsche,1973):受众范围的扩张造成庸众化,对意识形态的服从泯灭了高贵的初衷。在现代语境中,古典修养小说不免蜕化为市侩的、以功用性

为导向的“瓦解小说”(Auflösungsroman)(Mann,1965:153)。由此观之,托马斯·曼对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叛逆,毋宁说恰好是出于拒绝庸俗、坚守崇高的初心。接下来,我们不妨看看其修养小说中对人物形象的颠覆性处理。

托马斯·曼曾致信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我发觉我近来对人性思想的钟爱或许同一部耗时良久的小说有关。它是《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一类的修养小说,讲述的是(战前)一个年轻人通过体验疾病和死亡而认识到人和国家的理念。”(Mann,1962:199—200)。毫无疑问,信中所谈的小说正是他耗时10年方才完成的鸿篇巨著《魔山》:为探望生病的表哥,主人公汉斯计划前往位于阿尔卑斯山的一处疗养院暂住3周,却不知不觉在那里逗留了7年,下山后又立马披上戎装,投身战争,未来凶多吉少。不同于歌德笔下的迈斯特能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幸福,汉斯犹如活在真空中:他足不出户,在人烟稀少的高山接收来自四面八方、林林总总的文化观念和主义,于方寸之间砥砺智识水平,拓展思维视野。空间位移的缺失又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时间的线性延伸。山间混淆的气候使季节参照几近失灵,加之主人公对计时工具的放弃,导致其时间感知趋于主观化、相对化,传统认知里的“平原时间”(Könneker,2001)陷入停滞。托马斯·曼借此解构了古典修养小说的横纵维度,把广远的时空结构压缩至逼仄的私密领域,凝固主人公由单纯到成熟的进步历程。而对故事情节的淡化并未令曼氏笔下的人物塑造流于肤浅;相反,他在其中插入大量的独白、对话、随笔和文献,刻意模糊科学与艺术的边界,让主人公乃至读者参与艰深的精神跋涉之旅,为思想灌注气血,赋予角色思辨力。

除此之外,《魔山》中的教育方式也与迈斯特接受的那种集体性和社会性的教化大相径庭。诚如作者在上文提及的信中所言,汉斯的修养渠道实为疾病和死亡。这其实是时空冻结后主体意识增强的结果:在封闭范围内,人能更灵敏清晰地体验肉体存在,痛苦的患病过程也可以提高认识能力。尤其对艺术天才而言,身体疾病一方面虽必然导致体魄的日渐衰弱,另一方面却也会补偿性地强化患者的感知力、运思力及意志力。那这是否意味着托马斯·曼又退回到了“精神—生活”互不相容的思维定式?此处的答案取决于从何种角度来理解生命,若我们纯粹从现代生物学和医学视角来考察人的存在,难免一叶障目。在《论医学精神》(“Vom Geist der Medizin”,1925)一文中,托马斯·曼就明确反对文学批评界执着于《魔山》中的病理现象而忽视其中蕴含的教育性和道德性内涵(Mann,1960:593)。如此看来,曼氏生命观并非拘泥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还囊括了智性与文化属性。在此维度上,疾病不是对生命的贬损,而是通向深邃见识甚至“高阶健康”的必由之路。所谓“高阶健康”,是指精神和生活不再处于此起彼落的对峙状态,前者的强化能使人更加敏锐地体认生命,懂得更有意义地生活。

而与疾病密切相关的死亡则以一种“滑稽的形象”(Mann,1962:231)出现在《魔山》中,其固有的可怖面孔及庄严属性在曼氏幽默冷静的笔触下消解殆尽。死

亡成了疗养院里稀松平常的事,患者们在颓废的气氛里享受病痛,等待死亡。在一次次目睹身边人离世后,年轻的主人公汉斯渐渐熟谙生死之奥义:“一切对疾病和死亡的兴趣,不过是对生命的兴趣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已……死必然寓于生之中,没有必然的死也便没有生。”(Mann,2010:351—352)。也就是说,死亡并非对生命的粗暴否定,相反,它是后者的再现手段,二者相互依靠、彼此深化。那么,只接纳“生”的人性必然浅薄中空,唯经疾病和死亡淬炼而成的人性,才是深刻饱满的“新人性”。换句话说,无论小说与“病与死”的联系多么紧密,归根结底,其目的是恢复思想的纯洁性,升华人道精神。此等意义上,《魔山》亦属“智识小说”(Intellektueller Roman)(Mann,1962:173),即不落入实用主义窠臼,通过疏离庸常生活保持精神独立,重拾严肃思考的能力,为古典修养提供新的表现力。

总而言之,在修养小说创作上,相比于歌德,托马斯·曼致力于营造另类时空场域,让笔下人物在其中经受别样的精神历练。这既映射出他对传统修养模式之普适性的怀疑,也说明,在这位歌德仰慕者眼里,通向“圆满”之路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随外在环境变化而调整,从而会不断产生新的命题。就此而言,这又同《威廉·迈斯特》的开放式结局一脉相承了:主人公告别神圣集体,重新踏上寻找本真的旅程。如是观之,托马斯·曼对“迈斯特”模式的颠覆或曰创变,反倒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歌德人道精神的独特呼应和深情回归,即以反思和批判的目光考察时代潮流,推翻贫瘠陈旧的艺术形式,不断以极具个性的方式深切关怀并努力书写人性。此外,《魔山》中不乏神秘陌生的异质文明元素,它们在主人公的蜕变中起着关键的催化作用,让人不得不想到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

#### 4. 赓续世界文学观念:对东西思想智慧的融汇

自1827年初起,歌德围绕“世界文学”展开了一系列绵密集中的思考与讨论,在其1827年1月15日的日记,以及1月26日与27日的往来书信中,“世界文学”概念已初见端倪(方维规,2022:34)。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乃是1月31日,他与阿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的谈话:“一国一民的文学而今已没有多少意义,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我们每个人现在就该为加速它的到来贡献力量。”(Goethe,2007:134)可以说,它为19世纪的德国乃至欧洲敞开了“跨文化”乃至“跨文明”思维的大门,具有发凡起覆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并非其思想的灵光乍现,而是源自他对异质文化积极且广博的阅读——从近东的波斯、阿拉伯到印度再到远东的中国、日本。在这期间,他也愈发深信“诗是人类共同财富,而且正成百上千地,由人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间创造出来”(Goethe,2007)。可以看出,歌德的精神视野不断开阔,已然突破狭隘的欧洲界域,因此人类会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他的文学视域中。这是相当难得的,因为19世纪

不仅是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民族主义的时代,欧洲中心主义是此时欧洲社会的主旋律。在此,我们应该看到歌德的胆识和远见,面对民族中心主义思潮的兴起,他仍坚持推动文学的世界性和普适性发展。

当然,谈及“世界文学”,歌德还是难免会显露出一定的民族本位意识,他一边坚信“德国人能够而且应该最多地工作,在这场伟大的聚会中,他应该扮演一个美好的角色”;一边却又惧怕“德国人可能会失去最多”。(Goethe, 2014)这般矛盾的心态既反映出作者难以彻底脱离其德意志立场,也说明他的设想绝非抹杀民族特性的文学同质化,而是立足本源而又超越本源。如此观之,歌德追求的是文学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地方性和普适性等二元要素间的和谐均衡、紧密相连的整体状态。所以,有论者称歌德的“世界文学”用词具有较强的“动词性”,是一种“现象”“态度”和“行为”(方维规, 2020),亦诚如魏玛歌德学会前会长约亨·戈尔茨(Jochen Golz)所言,歌德理解的“世界文学”并非从荷马经但丁和莎士比亚直到他所处时代的经典著作之集合,而是主要意指一种交流过程。通过各种现代交通手段,世界各民族能够比前人更好地把握当下的文化进展,并且相互交流。(Golz, 2023)这样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并非拘囿于静态的作品集合,而是指向各民族相互镜鉴、彼此认同、取长补短的“精神贸易”(方维规, 2022: 68)。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之后,歌德的崇拜者托马斯·曼又将如何接续和践行这一设想呢?

1939年,流亡美国的托马斯·曼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题为“论小说艺术”(“Die Kunst des Romans”, 1939)的演讲,从中我们能强烈感受到全球性的文学交互对其创作观的影响与塑造。他认为,叙事文学的独到之处在于它是一种“创造过去的精神——这种创造发生在世界范围内,是无所不知且有宣化功能的”,小说的出现意味着这种文学体裁进入“不天真的、可以说‘更现代’的阶段”(Mann, 1960: 349—350),意即,通过远程回溯,小说能以观察者和分析者身份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建构密集的参照网络。因此,它不会压制或取代那些在时空和渊源上相距甚远的文艺作品,而是要将其吸收、整合、转化和发扬。为此,托马斯·曼还列举了源于埃及且可能是《圣经》中约瑟夫故事原型的《两兄弟的故事》,以及对中世纪动物诗乃至歌德《列那狐》(*Reineke Fuchs*)影响甚深的《伊索寓言》等。如是来看,叙事文学承上启下、贯通东西,因此“诗人的话正适用于它:‘你不会结束,这是你的伟大。’”(Mann, 1960: 352)。托马斯·曼引用歌德《西东合集》(*West-östlicher Divan*, 1819)中致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s)的献诗,意在凸显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绵延性。接着,托马斯·曼又将“伟大”定义为一种超然于世的客观“反讽”(Ironie)。在演讲中,他毫不吝啬地礼赞这一叙事文学之精神,认为它渴望整体,对包含无数事件和细节的世界采取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代表着最高的自由、平静,以及不受任何道德伦理迷惑的客观性(Mann, 1960: 352—353)。换句话说,当不同文化碰撞与交汇时,这一包容他者、考量自我的反讽精神格外适用,亦可为世界范围内的多元文化

构筑彼此认识与借鉴的文学场域。

无需赘言,托马斯·曼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方现代文明疲态尽显、知识界对理性主义产生严重质疑的年代。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将这悲观情绪的根源总结为“西方的没落”(Spengler,1998)。当此东升西落之际,欧洲思想界不得不迎接东方哲思的冲击与挑战。托马斯·曼对此思想图景之变化的反应,集中表现为小说《魔山》里两种道路的交织:汉斯对肖夏夫人的迷恋不仅来自爱欲,而且暗含意识形态的指向。来自俄国的肖夏象征着晦暗神秘、混乱野蛮的亚洲原则,在虚无主义大行其道的19—20世纪之交,这或许是一剂祛除人性中萎靡与软弱的“猛药”。但主人公汉斯的“导师”赛特布里尼试图通过对东方人无所作为、因循守旧的批判将其拉回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个不近人情的西方文化卫道士也自然被肖夏厌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魔山》对东西双向认同的阻隔,实则是在为反讽做铺垫:普遍共识不复存在,各种理论思维必须通过竞争取得权威。人不应臣服于任一准则,只需保持距离,中立全面地审视和比较。此态度离不开托马斯·曼对陀思妥耶夫斯基(Фёд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Достоевский)作品中“全人”(Allmensch)(Mann,1960:440)理念的借鉴,即与社会边缘人乃至罪犯亲如兄弟,直面俄欧文化差异的友善与包容。我们知道,尼采在他1887年的一篇笔记中曾提问:“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呢?”他答曰:“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daß die obersten Werthe sich entwerthen)。”(Nietzsche,2018)可见,虚无主义使个体失去信仰,在挣脱束缚后消极地走向绝望与空虚。所以,要战胜颓废、捍卫人性,既不能在某一绝对价值原则中苟且偷安,也不能在原有体系瓦解后的混沌中自暴自弃,而应在怀疑和未知中接纳多元、勇于试错。这便是托马斯·曼将斯拉夫思想与德意志本土美学结合形成的积极的“对人友善的虚无主义”(Nihilismus der Menschenfreundlichkeit)(Mann,1960:642)。

等到希特勒上台时,他又将中德文化或曰中西文明比较纳入其小说的反讽实验。《绿蒂在魏玛》中,作者让“伟大人物”歌德援引一句反对个人主义的中国格言“伟大人物是一种公害”(Mann,2008:332),借此论证两国的不同,惹得众人哄堂大笑。小说虽未直接点出孰优孰劣,但比照之下,德国人愚忠和盲从的“内在性”(Innerlichkeit)(Mann,1960:1142)显得格外醒目。结合史料来看,曼氏笔下的“伟大人物害论”其实是在影射希特勒和那些唯其马首是瞻的第三帝国群氓,迷狂扭曲的个人崇拜最终酿成了精神与物质双双崩溃的民族灾难。(Mann,1963:112)<sup>①</sup>在此意义上,这句所谓的“中国格言”被作者赋予了反法西斯的深意,这表明具有世界文学意识的托马斯·曼也更敏感地触及或预见德意志民族与世界命运之关系。

由此可见,托马斯·曼对歌德“世界文学”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在丰富当代文学

<sup>①</sup> 托马斯·曼在1939年9月26日写给儿子戈罗(Golo Mann)的信中表示,德国人将希特勒视为伟人并加以追随足证其精神的迷乱和狂热,对这样的民族还能指望什么呢?

表现形式的同时,还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即对文化自新和人道建设的反省与思考。无论是“对人友善的虚无主义”还是“中国格言”,都是解决同时代一元与多元、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之矛盾的创新性尝试,也为人格的自我完善之思开启了一条新的路径。

## 5. 结语

面对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托马斯·曼在文艺创作中积极思危、溯古、求变。他敏锐地洞见,理性主义的片面发展已然威胁到人格内在的完整,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逻辑必定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困境,于是他将这一切以艺术的手法忠实记录在自己的早期作品中。针对现代性危机,被视为救治方案的审美主义、虚无主义等流行思潮非但未起缓解作用,反倒加剧了颓废悲观的社会氛围。因此,托马斯·曼主动回望过去,试图从堪称德意志文化黄金年代的魏玛古典文学中寻得精神救赎之指引,而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近乎完人的歌德自然就成了他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于是,他将“亲和力”“市民修养”和“世界文学”纳入自身的美学实践,在相关文学文本中赋予其新的内涵。需要注意的是,这3个要素并非相互隔绝孤立,它们存在着紧密的内在关联:调和对立的“亲和力”需以“迈斯特”式健全人格为载体;“世界文学”为“人格修养”范式的推陈出新提供源头活水;各种文化相互包容、彼此尊重、平等共处的“亲和关系”则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基础。它们形成一个互为支撑的三角闭环结构,托马斯·曼以此为地基打造出其心目中能使现实社会焕然一新,为“没落西方”增添活力与变化的精神大厦。而正如他追随崇敬的歌德所言:“但是,即便让人类如其所愿般长久延续,使他们陷入麻烦的障碍永远少不了,人类为发展自身能力而遇到的各式困难永远少不了。他们将更聪慧、更具洞察力,但不会更好、更幸福、更精干,或者只是在某些时期如此。”(Goethe, 2006)对制度、信仰、文明的思索与追寻绝非一蹴而就,摆脱现代性弊端,改造落后思维是摆在每代人面前的与时俱进的命题。在这场无穷尽的征程中,托马斯·曼贯通古今、融汇东西的探索和试验也必将成为后人寻道之路上的光辉典范。

### 参考文献:

- 艾克曼,2007.歌德谈话录[M].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方维规,2020.起源误识与拨正: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历史语义[J].文艺研究(8):22-37,25.
- 方维规,2022.“世界文学”推原[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 谷裕,2023.德语修养小说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 包亚明,2003. 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罗兰·巴尔特,2008. 写作的零度[M]. 李幼蒸,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马丁·博拉赫,2014. 歌德的世界文学设想[M]. 范劲,李士勋,译//叶隼. 歌德研究文集. 南京:译林出版社.
- 尼采,2018. 权力意志[M]. 孙周兴,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托马斯·曼,2008. 绿蒂在魏玛[M]. 侯浚吉,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托马斯·曼,2010. 魔山[M]. 杨武能,译.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王金宝,1999. 现代性的危机与出路[J]. 学术研究(5):46-52.
-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978. 浮士德:第一部[M]. 郭沫若,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 约亨·戈尔茨,2023. 德国古典文学的历史基础和文化意义[M]. 莫光华,译//谭渊. 德意志研究.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 张汝伦,2018. 西方现代性与哲学的危机[J]. 中国社会科学(5):23-42,204.
- BLUME B,1949. Thomas Mann und Goethe[M]. Bern:A. Francke AG Verlag Bern.
- DIERKS M,2001. Thoams Mann und die Moderne[M]// Thomas Mann: Ein Klassiker der Moderne. Ortsvereinigung Hamburg der Goethe-Gesellschaft in Weimar e. V. Wettin-Löbejün;Verlag Janos Stekovics,18.
- ECKERMAN J P,2006. Johann Wolfgang Goethe Sämtliche Werke Münchner Ausgabe[M]. 19. Bd. München;Btb Verlag.
- KÖNNEKER C,2001. Raum der Zeitlosigkeit. Thomas Manns Zauberberg und die Relativitätstheorie [M]// HEFTRICH E. usw. Thomas Mann Jahrbuch. 14. Bd. 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223.
- MANN T,1960. Thomas Mann Gesammelte Werke [M]. 9, 10, 11, 12. Bd.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 Verlag.
- MANN T,1962. Thomas Mann Briefe 1889-1936 [M].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 Verlag.
- MANN T,1963. Thomas Mann Briefe 1937-1947 [M].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 Verlag.
- MANN T,1965. Thomas Mann Briefe 1948-1955 und Nachlese[M]. Frankfurt am Main;S. Fischer Verlag.
- MANN T,1983. Frage und Antwort Interviews mit Thomas Mann 1909-1955 [M]. Hamburg: Albrecht Knaus Verlag.
- MORGENSTERN K,1949. Über das Wesen des Bildungsromans [M]// SELBMANN R. Zur Geschichte des deutschen Bildungsroman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71.

NIETSCHE F W, 1973. Nietzsche Werke[M]. 3. Abt. 2. Bd.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SPENGLER O A G, 1998.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M]. München: C. H. Beck Verlag.

### **Return, Innovation, and Integration:**

#### **Goethean Elements in Thomas Mann's Works under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HONG Yutao MO Guanghua

**Abstract:** In the face of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caused by the Western rationality tha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world wars that annihilated mankind, Thomas Mann attempted to forge a spiritual path of redemption that bridges dichotomous oppositions and reshapes the perfect human personality. By embracing and developing Goethe's ideas on "affinity", "civic cultivation", and "world literature", Thomas Mann returned to the classics, innovated tradition, and integrated Eastern and Western elements in his works, aiming to heal the modernity ailments of European society. The trans-temporal resonance in his creative process fully reflects the high degree of alignment between Thomas Mann and Goethe in aesthetic philosophy, as well as the underlying German cultural heritage permeating their work.

**Keywords:** Thomas Mann; Goethe; modernity; affinity; cultivation; world literature

#### **作者简介:**

洪雨涛,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 主要从事德语文学和译介学研究。

莫光华, 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德语文学和译介学研究。